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下册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下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簽 陳望道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下 冊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2.75 字數 508,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統一書號：10186·547 定價：3.75 元

說 明

本書上起先秦，下迄「五四」以前，共分七編：一，先秦兩漢；二，魏晉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元；五，明；六，清代前中期；七，近代。第一、二、三編爲上冊，第四、五編爲中冊，第六、七編爲下冊。

本書編寫，力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比較系統地說明我國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和重要文論家的成就及貢獻；但由於編者理論水平和能力的限制，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希望讀者指正，以便我們修改和提高。

在編寫過程中，我們參考了一些國內學者的有關論著，從中得到不少幫助和啓發，文中未能一一註明，特此誌謝。

本書原由劉大杰先生主編，由我們組內幾位同志集體編著；劉先生逝世後，由我們繼續撰寫。參加本書下冊編寫工作的，有王運熙、顧易生、袁震宇、黃霖等同志，李慶甲同志參加了個別章節的編寫，楊明同志也參加了部份工作。

王運熙 顧易生

一九八三年七月

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目錄

說
明

第六編 清代前中期

緒
論

第一章 清初思想家的文學觀 ······

第一節

顧炎武

一

第二節

黃宗羲

一

第三節

王夫之

一

第二章 清代前中期文論 ······

第一節

侯方域、魏禧、汪琬、廖燕

一

第二節

方苞、劉大櫆、姚鼐、桐城派的古文和時文

一

第三節

學者的文論、章學誠和《文史通義》、駢文派和阮元、陽湖派和惲敬

一

第三章 清代前中期詩論 ······

一

第一節 清初詩論	二三
第二節 王士禛及其他	二四
第三節 葉燮《原詩》	二五
第四節 沈德潛、翁方綱	二六
第五節 袁枚、趙翼、鄭燮	二七
第四章 清代前中期詞論	二八
第一節 朱彝尊、陳維崧及其他	二九
第二節 張惠言、周濟	三〇
第五章 清代前中期戲曲批評	三一
第一節 金人瑞的戲曲批點和清初的曲論	三二
第二節 李漁	三三
第三節 洪昇和孔尚任	三四
第四節 清代地方戲繁盛時期的戲曲理論批評	三五
第六章 清代前中期小說批評	三六
第一節 金人瑞與毛宗崗、張道深	三七
第二節 關於《聊齋志異》的評論	三八

第三節 曹雪芹、脂硯齋及其他	三七四
第四節 閑齋老人及其他	四〇〇
第七編 近代	

緒論	
第一章 近代的詩文批評和詞論	四三

第一節 袁自珍、魏源及其他	四四
第二節 太平天國的文學方針與洪仁玕	四五
第三節 黃遵憲、梁啟超與「詩界革命」、黎廷樑的白話文體論、嚴復的翻譯理論	四六
第四節 章炳麟、陳衍與宋詩派、柳亞子與南社	四五
第五節 劉熙載、譚獻、陳廷焯的詞論、王國維的《人間詞話》	五九
第二章 近代戲曲理論批評的發展和演變	
第一節 十九世紀的戲曲理論批評	五六〇
第二節 梁啟超、姚華的戲曲理論批評	五六八
第三節 王國維的戲曲理論	五七九
第四節 《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和吳梅的戲曲理論批評	五九〇

第三章 近代的小說理論批評	四〇六
第一節 梁啟超與「小說界革命」	四〇六
第二節 吳沃堯及其他	四一三
第三節 徐念慈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小說觀	五一
第四節 王國維與王鍾麒、黃人的中國古典小說論	五七
第五節 林紓的翻譯小說理論	六八
第六節 管達如的《說小說》和呂思勉的《小說叢話》	七八

第六編 清代前中期

緒論

清代是中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專制王朝。然而在其前、中期還出現過國勢強盛、經濟與文化相當繁榮的高潮。這時傳統的古文、駢文、詩、詞等諸體文學和流派，都有專門家繼承發揚，進行理論總結。同封建制度腐朽性的日益暴露、社會新興力量的滋長相聯繫，詩、詞、文理論批評領域中既凝聚着復古的濃霧，也閃耀出反傳統的、具有民主因素的異彩。戲曲小說的創作與批評，則更有了巨大的發展。這時期的文學批評是相當豐富多彩的。

清初文學思想的光輝 在明清之際風雨如晦的劇變時代裏，思想界，包括文學思想中，却透露出燦爛的曙光。

明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李自成領導的農民義軍攻入北京，虎踞東北的清貴族統治者在明降將吳三桂等的引導下乘機入關，打敗農民軍，逐步消滅東南、西南地區的明政權，統一了中國。在這過程中，廣大人民遭到殘酷的屠殺與鎮壓，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但堅強不屈的民衆和各階層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在各地展開壯烈的抗爭，史可法、李定國、張煌言、鄭成功等無數英雄人物，以熱血寫

下可歌可泣的史詩。

在這時期出現的進步思想家，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經歷了嚴峻的時代考驗與鬪爭鍛煉，對社會現實的認識更加深刻。他們憤怒地斥責封建統治者的貪暴罪惡，同情人民水深火熱的災難，意識到自己的嚴重歷史責任，沉痛地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艱苦探索國家未來方向，在著作中閃發着樸素的唯物論和民主精神的光芒。他們在文學方面發表的許多意見，是這時期文學批評史上的重大收穫。他們都非常重視文學與時代的關係，並作了深刻的闡述。黃宗羲揭示了劇變的時代促使文學的發展出現高峯，而真實反映時代悲劇及忠臣義士抗爭活動的詩歌，不僅可以「以史證詩」，還能「補史之闕」；蘊蓄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受壓抑於一時，終將對未來歷史產生巨大影響。他特別強調「情」在創作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意識，還進一步指出不只寫「私為一人之怨憤」，應使其人的淒楚蘊結「出於窮餓愁思一身之外」，抒發悲天憫人的懷抱。顧炎武提出「文須有益於天下」，嚴格要求一切作品必須有益國家社會，有用於當時後世，把直言議政、批判現實當作詩人的莊嚴責任。王夫之辯證地分析了詩歌創作的「情」「景」關係，對「興、觀、羣、怨」和「比興」原則作了新的解釋，兼顧詩歌的社會意義與藝術效果。他還突出強調「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揭示了生活實踐對創作的關鍵意義。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對明代以來文壇的擬古陋風、門戶偏見以及束縛創作的種種清規戒律一致表示強烈不滿。由於對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有精到的認識，使他們的反摹擬、主獨創的主張建立在結

實的理論基礎上，有力地鍼砭了時弊。

他們的理論主張常常通過孔孟學說的形式表現出來。黃宗羲要求個人情感能具有普遍意義時甚至說「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他們崇尚實學和經世致用，却不能認識李贊等思想中的進步性，對通俗文學一般採取否定的態度。這些都是保守的成份。

傳統詩文諸體風格流派的總結 清代康熙、雍正兩朝，統治秩序逐漸鞏固穩定，社會生產力由恢復而發展，到乾隆時期達到了昌盛的頂點，封建經濟和文化也高度繁榮起來。晚明萌芽的資本主義因素這時又有了滋長。統治集團的貪慾隨政權強化和物質財富增長而無限擴大，封建制度的腐朽性也進一步暴露出來。在沉重的壓迫下，廣大人民的反抗鬥爭日趨激烈。乾隆後期至嘉慶年間，各種社會矛盾愈加尖銳激劇，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西方炮艦打開古老王朝的大門，中國開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的王朝，清代的封建專制統治比前代更爲嚴厲，這對學術文化產生很大的影響。清廷在全國建立統治後，對各族人民採取鎮壓與懷柔兩手政策，積極保存傳統的道德、習俗、文化，並加以嚴密鉗制。對於知識分子，一方面廣興文字獄和其他慘案，緣於一字一句的觸犯嫌疑和無端罪由，而輾轉株連，大施屠戮迫害；一方面以博學鴻詞科等籠絡宿學遺老，以八股科舉培養奴才，提倡封建教義程朱理學和埋頭古籍脫離實際的漢學。以官修圖書來說，康熙朝有《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乾隆時規模更大，如《四庫全書》等，都廣泛網羅人材，引導他們以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既以點

繼盛世鴻業，保存了豐富文獻資料，同時進行思想文化統制，對有反清意識、觸忌犯諱的書籍字句，大量加以銷燬刪改。在這種氣候下，大部分知識分子不是直接作御用文人，便潛心鑽研古代典籍，避免接觸實際政治。因之，有清一代，對於古代的經學、史學、子學、文字音韻訓詁、金石目錄版本等等，無不有專門之家在孜孜矻矻考核詮釋、辨僞輯佚、整理研究。康、雍、乾、嘉時期的官修圖書和私家著述，在學術文化史上是有巨大貢獻的。然而明末清初以來的進步思想、民族意識被窒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研究經史之學以經世致用的根本精神被偷梁換柱了。文學創作和批評方面也是這樣，在這階段中，古代曾經出現過的各種文體和不同風格流派，幾乎都有人在重振旗鼓，總結傳統經驗，從事理論與資料建設，作出不少成績；但他們往往偏重繼承而相對地缺少創造的精神。

清代前中期的散文家多數繼承明代唐宋派的傳統。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即基本如此，但還稍有異端。侯方域論文注重細節的生動描繪，因小見大。這是古代史傳文學的經驗，也吸取了新興的「小說家伎倆」。魏禧自述為文旨趣「好窮古今治亂得失」，強調「積理」「鍊識」與「變」，淵源於宋代蘇氏父子而有所發展，但所論主要局限於議論文章。汪琬注重文章藝術性，對「文以載道」之說公然表示懷疑。然而他拘守唐宋大家古文法度以為不可違離，則是相當保守的。

方苞、劉大櫆、姚鼐的桐城派是清代最大文派。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講求「義法」「雅潔」，以程朱理學為正宗，以《左傳》、《史記》、唐宋八家文章為規範，奠定了桐城文論基礎；劉大櫆論析行文的神氣、字句、音節，對古文寫作藝術經驗進行了探索。姚鼐提倡「義理」「考證」「文

章」的統一，「陽剛」「陰柔」兩美的結合，「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諸藝術法則的相互作用，是桐城文論的集大成者，對散文理論建設是有貢獻的。但他們文論的根本精神，與王朝官方哲學，與統治者對八股文的「清真雅正」「理法兼備」的要求相吻合。桐城派古文與八股文有不解的關係，雖然也不能把兩者相等同。一些經史學者不滿桐城派古文空疏庸弱之弊，作了許多中肯的批評，但他們常常對文學藝術的特徵缺少認識，有輕視文藝的傾向。惲敬、張惠言的陽湖派提出「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力圖擴大取法的途徑，但並沒有超越復古的範圍。

清代致力於駢文的也頗不乏人，一時稱盛。他們比較注意駢文的文藝價值。阮元等重伸六朝「文」「筆」之辨，以駢文爲美文正宗，與古文派別樹旗幟，但理論上並沒有多少新鮮內容。

清代前中期的詩家大都標榜宗唐或宗宋，各立門戶。宗唐的還可分爲尊李（白）、杜（甫）、尚王（維）、孟（浩然），取法初、盛或中、晚等派；宗宋的也有崇奉蘇（軾）、黃（庭堅）、范（成大）、陸（游）等的區別。

清初著名詩家錢謙益、吳偉業都還比較注重詩歌的時代內容，多抒發身世之感。吳氏宗唐詩，錢則由唐而及於宋元之詩，主張「別裁僞體」、「轉益多師」。他編《列朝詩集》，以總結明代詩學爲任務，其觀點淵源於明唐宋派、公安派及程嘉燧，對前後七子及竟陵派痛加抨擊，而特別推崇李東陽一脈。錢謙益批判擬古風氣是激烈的，但抑揚過當，存在褊狹的門戶之見。其後學馮班、吳喬又偏宗晚唐李商隱及西崑體。朱彝尊編《明詩綜》，給李夢陽等以較好評價，即是有意與《列朝詩集》相補充。

康熙年間詩壇盟主爲王士禛，他曾在尊三唐和宗宋元的道路上輾轉反側，論詩內容豐富，涉及方

面也較廣；但主要興趣所在，尤其是他的後期，偏尚「神韻」之說。他繼承與發揚唐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和宋嚴羽「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論詩旨趣；崇尚盛唐王維、孟浩然詩歌中沖澹清遠的風神韻味，在藝術意境風格方面有其獨到的體會。這種詩說、詩風是符合清王朝穩定封建秩序的要求與士大夫階層許多知識分子的生活創作情趣的。

乾隆時期沈德潛尊崇李白、杜甫的雄渾宏壯格調和「溫柔敦厚詩教」，要求詩歌具有社會內容和教化作用，其根本目的是爲了更有效地爲封建統治服務，反映「盛世」的風貌。翁方綱爲了補救神韻、格調爲詩的空寂浮響之弊，標舉「肌理說」，提倡以學問考證充實詩歌，學習黃庭堅「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實爲「學人之詩」的代表。這個歷史階段又有宋犖、吳之振、查慎行、厲鶚等的提倡宋詩，顧嗣立的編選元詩。這些宗唐、宗宋諸家大都力圖別尋蹊徑，紹述正宗，在總結前人寫作經驗和整理文獻資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工作，然而沒有能處理好繼承與創造的關係，也缺少進步的社會理想，就不免始終徘徊舊轍，或局處偏隅，限制了理論批評的成就。

詩文批評中的新變理論和異端傾向 在詩文批評領域瀰漫着的復古氣氛中，也不時有異端的閃光照耀。葉燮、廖燕、袁枚、鄭燮、趙翼、章學誠等，尙新變，反教條，繼承與發展前代的進步思想，不同程度上反映新興的社會因素，在文學理論上作出創造性的成就。當然也存在各自的局限。

葉燮的《原詩》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本時期詩文理論的重大成果。

《原詩》是古代詩話中最有系統性、理論性之作，縱論詩歌發展的「源」、「流」、「正」、「變」，而以

「踵事增華」、「因事遞變」來揭示詩歌演進的趨勢，以「沿」、「革」、「因」、「創」來分析創作的繼承與革新關係，具有進化論與辯證法的因素。它還以「理」、「事」、「情」和「才」、「膽」、「識」、「力」比較全面地概括詩歌所反映的客觀世界事物與詩人從事創作的主觀條件，對於詩歌的思想現實內容與藝術形象特徵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原詩》在論美的本質與形式的統一、風格的多樣化與其相互結合等問題方面，也有相當精闢的見解。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綜合評論史學、文學的名著。他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反對以儒經為教條，反對「離事而言理」，是有唯物論傾向的。這樣，他的主張「義理」「博學」「文章」三者結合，比諸姚鼐「義理」「考證」「文章」之說，有了較為充實和新鮮的內容。他又強調作者「才、學、識、德」兼備，痛切地針砭了當時古文（主要指桐城派古文）寫作中各種拘泥陳規舊套之弊，雖然其論也有吹毛求疵和對藝術手法的總結否定過當之處。

葉燮所要遵循的「風雅之道」、章學誠指斥袁枚的宣揚言情之作為「非聖無法」及宗奉《離騷》、《史記》「怨」「憤」之說者為「心術不正」，則都還是以封建道德規範為準繩的。

廖燕的文學思想雖在當時影響不大，却富有異端色彩。他大膽揭露科舉八股取士制度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他非常重視文章社會功用，「將以經天緯地為文章，輔相裁成為事業」；認為著作應是「自抒憤懣」和「性靈」，力求自由獨創，向客觀世界學習。這裏既有追求個性解放的因素，也懷着改造社會的理想。廖燕把小品文比喻為「照乘粒珠」和「匕首寸鐵」，強調它短小精悍而意義深遠、批判有力的特点。

徵；又論孟浩然詩而突出其中含蘊不平的憤慨和高尚不羈的豪情，高度肯定文學評點在啓迪才人心智方面的作用而竭力推崇不久前爲清王朝所殺害的金聖歎，都表現出某種憤世抗時和反傳統的精神。袁枚的「性靈說」強調抒寫個人的真實情感。他「最愛言情之作」，認爲「情所最先，莫如男女」，並注重有靈機趣味的筆致。這是對晚明公安派文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與清代當時江南一帶資本主義因素的興起也有某種聯繫。袁枚深刻地譏諷了「神韻」「格調」「肌理」諸說所產生的形式拘泥、模擬復古、典故堆砌種種弊病，對繼承與創新、性情與學力等關係作了比較全面的論析。他對沈德潛宗法唐詩和溫柔敦厚說的批判，有力地衝擊了傳統文學思想中崇古卑今的陳腐觀念和禁錮人們身心創作的教條，揭示詩歌演變發展的必然性、題材風格多樣化的合理性。這是有反對封建禮教的進步意義的。然而他忽視詩歌的社會現實內容和作用，混同健康愛情與庸俗豔情的區別，對創作的嚴肅性也不够注意，則是其局限。趙翼極力崇尚創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詩句，氣魄何等豪邁！鄭燮熱烈嚮往「直擗血性爲文章」，注意反映民情時事。他們與袁枚文藝觀點基本一致而各有自己的成就，都是這時期進步思潮的組成部分。

詞學中興和理論發展 宋元以後，詞學衰微，清代號稱中興，尤其詞論比前代更加繁榮。

清代前期，推崇蘇（軾）、辛（棄疾）豪放詞風的有陳維崧、曹貞吉等，宗奉南宋姜（夔）、張（炎）雅正格律的有朱彝尊、汪森等，繼承與發揚南唐李煜、北宋晏幾道一脈的有納蘭性德。他們都極力推尊詞體，反對「詞爲小道」「詩餘」等傳統偏見，把歌詞創作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詞作的繁榮

起了促進作用。雖然他們有些關於詞體發展歷史的論述並不合乎科學實際。

朱彝尊開創浙西詞派，他所鼓吹的「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汪森的推崇「句琢字鍊，歸於醇雅」，與王士禛的「神韻」詩說、方苞的「雅潔」文論相互呼應，都是適應時勢的產物，分別為詩、文、詞壇的「正宗」。陳維崧創陽羨派，論詞注意抒發時代身世的感慨，崇尚雄豪的風格和獨創性。他既不滿花間派溫庭筠、韋莊及張先、周邦彥等婉麗工緻的詞風，也反對「向豪蘇膩柳尋藍本」。「豪氣軒然獨有」、「萬馬齊瘞蒲牢吼」、「耳熱杯闌無限感」等意氣風發的詞句，表現出他的不同於傳統的創作傾向。曹貞吉宣稱「嶽崎歷落，辛、陸遙遙一瓣香」，與陳維崧的觀點基本一致。納蘭性德強調詞繼承了《詩經》比興和風人之旨的傳統，他主張對於晚唐五代南北宋諸大詞家都有所取，眼光較為寬闊；讚賞李煜詞為兼有《花間》「貴重」與宋詞「適用」之美而「更饒烟水迷離之致」，則表示了自己特殊的會心所在。陸以謙的《詞林紀事序》注重詞的現實內容和社會意義，認為詞繼承了《詩經》「無非事者」和「興、觀、羣、怨」的精神；又指出「閨房瑣屑之事，皆可作忠孝節義之事觀」，也是詞論史上值得注意的文獻。

嘉慶年間興起的常州詞派，以張惠言、周濟為代表，針對浙西末流空寂雕琢和陽羨餘脈虛浮賣弄的弊病，提倡風騷精神和比興手法。他們強調「意內言外」，「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等等，要求詞作內容深厚而表現隱微，風格渾涵而意義廣遠，對於詞體的思想與藝術特徵確有所認識與抉發。然而他們所謂「寄託」未能同社會現實與進步生活理想相聯繫，片面追求比喩含蓄，奉溫庭筠、周邦彥、吳文英、王沂孫等詞為典範，往往對古人之作牽強附會地尋求微言大義，他們自己的創作也不免有以迷離恍惚